



民国时期鲁东乡村 防卫研究 (1912—1937)

On the Rustic Defense of Eastern Shandong Province
in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37

杨焕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鲁东乡村 防卫研究（1912—1937）

On the Rustic Defense of Eastern Shandong Province
in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37

D693.6²
011

杨焕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鲁东乡村防卫研究(1912—1937) / 杨焕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161 - 1690 - 6

I. ①民… II. ①杨… III. ①农村—自卫—研究—山东省—
1912—1937 IV. ①D693.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349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徐 楠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28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学术史回顾	(9)
三 概念界定及相关说明	(14)
四 本书结构及研究资料	(20)
第二章 山东地方政权近代合法性危机	(25)
一 政治合法性、合法性危机的定义及表现	(27)
二 军政混乱、基层政权腐败	(30)
三 军阀政权残害乡村，信仰危机加剧	(38)
四 灾害频仍，国家社会整合能力下降	(52)
五 乡村社会对山东地方政权的认同与信仰危机	(58)
六 小结	(65)
第三章 土匪、政府与农民三者在乡村中的生存博弈	(70)
一 土匪与农民：来于斯毁于斯	(71)
二 政府与土匪：制造与围剿	(83)
三 士兵与土匪：合法与非法的身份混淆	(90)
四 政府与农民：利用与疑惧	(96)
五 讨论	(100)
第四章 秘密会社与乡村自卫	(103)
一 民间信仰与政府的社会控制	(106)
二 乡村秘密会社的兴起	(114)
三 宗教仪式与乡村社会动员	(121)
四 在自卫与动乱之间：红枪会的双重性	(132)

2 民国时期鲁东乡村防卫研究(1912—1937)

五 小结	(142)
第五章 国家与乡村防卫体系(上)	(146)
一 现代警察体系在乡村基层社会的确立	(147)
二 基层行政体系与乡村防卫	(156)
三 乡农学校与地方防卫	(162)
四 联庄会	(171)
第六章 国家与乡村防卫体系(下)	(182)
一 民国时期乡村民团的兴起	(183)
二 韩复榘督鲁前国家对乡村民团的控制	(190)
三 韩复榘与山东民团	(200)
四 讨论:国家、社会与乡村防卫	(211)
第七章 基层防卫与乡村革命	(216)
一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乡村防卫组织的分析及策略	(217)
二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乡村防卫力量的分析及对策	(227)
三 基层防卫与乡村革命	(236)
四 小结	(245)
第八章 讨论	(247)
附录	(259)
参考文献	(264)

图表目录

表 2—1	山东历年各省田赋增加指数	(40)
表 2—2	山东历年来田赋（正税）增加表	(41)
表 2—3	1928 年山东部分地区预征田赋年份	(42)
表 2—4	1927 年山东莱阳农民田赋一两征收附税情形报告	(42)
表 2—5	1935 年田赋额征正税及附加税数目及附加税正税 之百分率	(43)
表 2—6	山东省 1928 年公债数目	(43)
表 2—7	历年军费的负担统计	(43)
表 2—8	军费占政府支出总数的百分数	(44)
表 2—9	1912—1921 年政府发行的各种公债不完全统计	(44)
表 2—10	山东省莱州 1912 年和 1928 年税率比较	(46)
表 2—11	1929—1930 年两年中报纸上所见实物兵差的种类	(48)
表 2—12	山东各县 1928 年度上半期平静区域的兵差与 地丁正税的比较	(49)
表 2—13	山东各县 1928 年度下半期平静区域的兵差与 地丁正税的比较	(49)
表 2—14	山东部分县份 1928 年度平静区域的兵差与 地丁正税的比较	(50)
表 2—15	1914 年全国自然灾害统计	(54)
表 2—16	1928 年、1929 年山东灾民调查统计	(56)
表 3—1	诸城、昌邑、高密、安丘及掖县土匪状况不完全统计	(75)
表 4—1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岛、烟台、潍坊地区秘密 会社不完全统计	(117)
表 4—2	鲁东地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县市红枪会 兴起原因统计	(118)
表 5—1	鲁东地区部分县份地亩产调查数目统计	(174)

4 民国时期鲁东乡村防卫研究(1912—1937)

表 5—2 鲁东地区部分县份动产调查数目统计	(174)
表 5—3 1934 年鲁东地区部分县市联庄会员训练情况统计	(175)
表 6—1 民国初年胶县保卫团各种数字统计	(193)
表 6—2 1934 年山东省寿光县地方捐款支出统计	(207)
表 6—3 1930—1935 年平度县岁出经常门统计	(208)
民国时期鲁东地区示意图	(16)

第一章 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甲问：今天好不好？

乙说：唉呀！现在的世道，是乱七八糟，没法说。

甲说：为什么乱七八糟呢？

乙说：今天拿捐，明天派税，实在不能活了！

甲说：提起我们农人的痛苦，真是多，真是一言难尽！

第一，今年要交那过年粮，又要完后年的粮，一年得拿三年的粮钱，为什么不难过呢？

第二，除粮钱以外，还要派门头捐，因为派捐是没有什么一定的，一年不定几次。又特别捐、验契、公债，等等，不管有钱无钱，都得拿！为什么不痛苦呢？

第三，除此以外还有些想不到的苛捐，更厉害，今天要，就不能等到明天！

第四，军阀打仗，就要拉夫、要车、要豆、要草、要干柴。他也不要收不收，就得给他！打胜了或是打败了，兵匪又到处抢夺骚扰，农民实在受不了了！

第五，农民们种几亩田，劳苦了一年，全指望收粮食才能生活，军阀不问收不收，所派的苛捐杂税等，总得拿，不论理的压迫，不准农民说话！

第六，农民还得受绅士们的压迫，怎样压迫呢？（一）劣绅在地方包办诉讼，如无事发生，他就不能从中取利，因为想得利，所以没事要有事，小事挑成大事，如穷富二人争讼，富人有钱给他，无理反来有理！穷人因无钱，有理而反无处申冤！实在不平。

2 民国时期鲁东乡村防卫研究(1912—1937)

(二) 绅士包办和承办收税厘金,公卖,印花,赌捐等局,他搜刮的手段,故意特别罚金!如管地丁税,绅士下乡,私自取利,加害于农民,农民因不知内情,无法反抗!

第七,现在我们特别痛苦又来了,军阀要筹备军饷,叫农民种鸦片,一亩地抽五块洋钱的捐,叫市人还做玉石丸(吃了,可不吃鸦片,好家伙!上了瘾更不能断!)好多多抽他们的税!焦作小官僚就照这样办,也不管人民多大苦处,也不管兵士怎样欺诈,压迫农民!

第八,说起我们做工,那就更苦,烈日当空,也得到田里去,汗像雨一般往下淌!皮肉晒得像黑铁一样!风里雨里也得要去,冰天雪地也得要跑!真是吃人饭,做牛活!

第九,过着天灾人祸,天干了或是打仗了,就活不成,就要借债,乡村里的大土豪,大地主,借钱给穷人,又要很高的利,可怜穷人因为这样,就更叫穷了!

第十,不管哪个乡庄,都有保卫团,归绅士先生包办,保护绅士和地主的利益,穷人得不到一点好处,还要捐钱,养活保卫团!

第十一,基督教、天主教在乡村传道,就是麻木农民的麻药!他说别人打你,不要动手,人骂你,不要开口,只要信耶稣,死后就能上天堂,我们农民要想想,这不是好像用绳子把我们捆绑起来了吗?好让他们随便打骂,剥削,压迫,我们还甘心愿受吗?最可恶的,一些基督教徒,仗着洋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乡村欺压平民。^①

这是1927年冯锦堂在《中国青年》记录的两个农民的对话,冯先生用农民聊天的方式,以理性的思维、讥讽的口吻、总结性的语言,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破败的画面。在这些画面当中所有的角色都栩栩如生,各种势力、力量及因素在当时破败的乡村中的地位与作用都跃然纸上,国家、地方政府、帝国主义、乡村精英、军阀、土匪、农民、基督教与天主教、战争与灾害等几乎所有与当时农村相关因素都在这短短的对话中体现无余。

清末新政以来,国家便开始了向基层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长期以来传统的乡村社会相对静止的生活状态开始被打破,开启了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辛亥革

^① 冯锦堂:《两个农民谈话》,《中国青年》第6卷1927年第126—150期。

命结束了几千年来的王朝统治，中国政治也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纵深转化，这一转化逐步由都市波及了乡村。然辛亥革命最初带给乡村的绝非只是积极的东西，更多的则是消极的因素。“辛亥革命后，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基本上在于如何建立并稳定统治结构。”^①

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很快便被袁世凯所窃据，北洋政府的统治由此开始。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来讲，北洋政府的统治是以现代政治的某些形式来推行中国传统的政治内容。对于军阀政治，费正清与赖肖尔有过精彩的论述：“在旧的权力结构崩溃时，其下层的、地区的那一部分仍在发挥作用，并努力在更高级别上创建全国性的组织机构。”^② 美国学者齐锡生则以“权力平衡”等视角对军阀政治进行了解析。^③ 近来有众多的学者以亨廷顿的“普力夺”政权模式对北洋军阀政权的性质进行解析，潘敏则认为北洋军阀政府政权的性质为一种超越特定阶级利益的“波拿巴式政权”。^④ 而李月军等人则认为辛亥革命后形成了“多头军权政治”。^⑤ 张佩国则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北洋军阀时期的政治结构进行了解析。^⑥

袁世凯死后，中国便陷入了军阀长期混战的局面。各派军阀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了角力，中国社会进入了混乱的状态，乡村社会尤其如此。正如斯考切波所总结的那样：“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王朝衰落和政权统治的空位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经济困难，农民贫困，社会性盗匪蜂起，地方民团，匪帮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军队之间的暴力冲突。这些特征贯穿于整个时期，并在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达到登峰造极，几乎不可收拾的局面。”^⑦ 近年来，学术界对北洋军阀时期这段历史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关于研究综述可参考来新夏等人的文章。^⑧

① [美]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② [美]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8页。

③ [美] 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 潘敏：《北洋军阀政府政权性质再探讨》，《黄冈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⑤ 李月军、侯尤玲：《北洋时期军权政治与国家现代性的成长》，《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⑥ 张佩国：《北洋军阀政治结构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东方论坛》1997年第4期。

⑦ [美]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⑧ 来新夏、莫建荣：《50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述论》，《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5期。

为了获得支撑战争所必需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军阀政权大肆对乡村进行掠夺式盘剥,乡村社会日益贫困。陈志让对此有着深入的研究,其不朽之作《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军阀政治时期的方方面面的参考。^①与军阀战争相对应的是,盗匪在乡间蜂起,大肆劫掠,散兵游勇也对乡间进行侵扰,其对乡村的危害尤甚于土匪。北洋军阀时期也是中国政权合法化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与权威性日益失去人民的信任。乡村社会秩序异常混乱,整个乡村面临崩溃的边缘。乡村社会在民国时期处于整个社会中最脆弱的一环,乡村安全与乡村防卫成为当时乡村社会的首要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中,乡村防卫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国家政权对乡村提供的保护。但自清末以来,尤其是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无法提供传统社会中国家对基层社会的保护作用,在此情形之下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逐步被打破。其二是中国传统的以士绅为核心的乡村防卫体系。然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传统士绅日益发生分化,士绅在基层处出现了劣化的趋势,原先的乡村士绅便逐步被土豪劣绅所替代。在此情形之下,传统士绅在乡村的功能日益丧失,中国乡间传统的防卫体系也日益被破坏。为了保卫乡村安全,抵御外部威胁对乡村的侵扰,民国时期乡村社会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自我防卫的措施,既有日常的维护乡村安全的护青、巡更等行为,但更多的则是为了抵御外部对乡村侵扰的自卫团体,如联庄会等,甚至借民间秘密团体作为自卫团体的组织形式。乡村自卫团体的涌现,其作用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对于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维持乡村社会治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对国家向基层社会的渗透过程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与阻碍作用。

国家在向乡村基层社会渗透的过程中,采用具有现代性的警察体系对乡村防卫体系进行改造,以强化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然而这一过程是曲折的甚至是反复的,因为现代警察体系对于治安的维持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在混乱社会中的作用,因而在民国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着是否以乡村警察取代乡村自卫团的争论。面对乡村众多的乡村防卫团体,国家一方面试图利用以扩大自己的军事势力,安定乡村社会秩序,维持其在乡村社会的政治统治;另一方面则

^①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试图改造、整编，以期抵消其对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对民间秘密结社则行大肆屠杀剿灭之策。民国时期，国家与乡村自卫团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国民政府为了抵御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武装革命，1932年开始在基层推行保甲制度，1935年前后保甲制度开始在山东推行。保甲制度是国家控制基层社会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其对乡村防卫体系的影响也具有深远意义。

山东省由于自身独特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地位，历来是各种政治势力的必夺之地。自辛亥革命以来，尤其是袁世凯死后，山东省政治便陷入了混乱之中，省政权及地方政权更替频繁。为了支付军阀混战所必需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历届军阀政府对山东乡村的剥削是异常残酷的，尤其是张宗昌督鲁时期，其对山东的盘剥可谓达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民国时期，山东乡村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兵匪横行，盗贼蜂起，为谋自保，山东乡村兴起了各式各样的自卫团体，对于抵御兵匪对乡村社会的侵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山东地区民间秘密结社异常发达，自义和团运动以来，各种秘密结社隐伏于乡村社会之中，为求自保，许多地区兴起了以红枪会为代表的秘密结社，秘密结社对于团结乡村民众、进行乡村社会动员、抵御外来侵扰起到了其独有的作用。红枪会一经兴起，便在山东地区广泛传播开来，在张宗昌督鲁时期以红枪会为代表的秘密结社席卷了整个山东。秘密结社在山东乡村防卫的作用是双方面的，其兴起之初，对于乡村自卫、安定乡村社会秩序、维持乡村社会治安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军阀政权对秘密会社的镇压，加之秘密会社本身的缺陷，在其兴起后不久便引起了乡村社会的混乱。

蒋、冯战争后，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督鲁时期是山东政局自民国以来相对稳定的时期。韩复榘为了稳定政治秩序，安定乡村社会，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扩大自己的军事势力，在乡村树立自己的威信，确认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在山东大兴民团军，将全省民团划分为五路。韩复榘一方面对乡村自卫组织加以利用与改造；另一方面为了强化对乡村基层的渗透与控制，命令山东各级行政机构及其他机关举办乡村防卫武装，因而这一时期乡村防卫体系出现了与以前不同的特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为便于乡村建设实践，追随韩复榘由河南来到山东，故韩复榘督鲁时期山东也成为乡建派进行乡村建设试验的重镇。梁漱溟试图从乡村社会自身出发，以乡村建设为途径，挽救乡村危机，找出一条适合中国乡村建设与乡村发展的道路。梁漱溟倡导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各地进行乡村建设实践，涉及乡村社会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为了强化乡村自卫能力,安定乡村社会政治秩序,梁漱溟等人试图以建立乡农学校为手段,以寓兵于农的方式,完善乡村防卫体系,以传统的手段来强化乡村自卫。因而韩复榘督鲁时期山东地区的防卫体系是立体的、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体现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

鲁东地区也因其独特的地理、政治、经济与军事地位,在山东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然鲁东地区一直偏离中央政权及山东省政权的核心区,即使在韩复榘主鲁时期,为争夺胶东,韩复榘与胶东军阀刘珍年进行了多年战争。鲁东地区体现了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特征,乡村防卫也错综复杂。中共在报告中提道:“在胶东一带,因为被胶济铁路隔开,纷乱得更厉害:日本帝国主义者,直鲁军的残部(如刘志陆、方永昌、祝样本等),所谓受冯、蒋两总司令委任的一些国民革命军(如刘景山、马汉臣,已被当地农民用棍打死),民团土匪(有些也打着党军的旗号去招摇撞骗)。不但整个的胶东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状态,就是在每一县中,也是一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他们到处勒索给养,征发民粮,冲突时起,民众益为其所害。”^①这种混乱的状态也为各种势力提供了展现自我的历史契机,“因此整个的胶东就陷入一种日本帝国主义、土匪、庄户、南军、直鲁残部、假名国民军、大刀会、黑旗会、民团……势力割据的局面。抢劫、骚扰、刮削,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②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与传统社会诸多不同的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也许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列强在山东以港口沿海城市为据点,逐次向内地辐射与渗透。正如中共山东分局所指出的那样:“胶东三面环海,港口很多,交通便利,如威海卫、烟台、青岛等处,向为帝国主义之角逐场。青岛长期有日兵驻扎。威海卫有英海军。烟台虽无帝国主义军队,一旦有事,日兵不到六小时即能由大连开到。”^③帝国主义在其所直接控制的区域,如青岛、威海,在很大程度上移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采用现代的管理方式进行殖民

①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全省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趋势给中央的报告》,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7页。

② 《山东省委对胶东工作决议》,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页。

③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9页。

统治。^① 尽管这种模式带有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沿海城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本质，但无疑也具有先进性的一面，尤其是在战乱时期呈现出与鲁东内地乡村不同的形态，正如时人所观察的那样：“鄙人自幼外出，于中国之各区巨埠，大半往游，各地之繁盛冷落，虽有不同，而其人民所受之兵灾匪患，则莫不相同。虽人民之不同，亦是当道诸公，惟知争权夺利，而于剿匪不力之所致。及今秋倦游归里，纵览威海大英界内商业之发达，市面之繁盛，人民之乐安，较之他处，诚有天渊之别也。既无兵灾亦无匪患，民享安居乐业之幸福。”^②

胶东沿海城市与租界，成为民国时期乡村士绅及精英避难之地，如1921年威海卫，“自民国以来，各处兵灾匪患，层出不穷，民不堪扰，避于租界，威海亦其一也，故人口数目，年有增加。……本埠僻处海隅，物产微薄，民生本甚艰苦，特因地方安谧，无兵匪之骚扰，人民得从容过活，尚可温饱，较之内地，反觉安适”。^③ 1931年，W. R. 迈尔斯对山东胶州的报道说：“回顾过去的10年（20世纪20年代），山东遭受了一系列的天灾人祸，绝大部分乡绅都逃往城市以求暂时的庇护，贫苦百姓只好去闯关东。”^④

近代胶东沿海城市的发展是以掠夺内地乡村为代价的，城市的繁荣与乡村的破败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鲁东乡村在近代也近破产崩溃的边缘。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诸多学者与政治家纷纷提出拯救乡村的言论、活动，战前掀起了拯救中国乡村的运动。正如徐畅所言：“20世纪30年代前期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一见到‘农村’二字，接着就找‘破产’字码。”^⑤ 在乡村破产的危机下，鲁东乡村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多种方式以求自存，当兵、为匪、下关东为其主要三途，因而对鲁东乡村的研究从区域史的视角来考察城市与乡村的异同，可以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鲁东乡村社会既有典型性、代表性又有普遍性。正如王先明所指出的那样：区域史的研

① 可参见〔德〕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4—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彩霞：《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历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等论著。

② 《当头棒》，《威海午报》，1927年12月15日。

③ 《山东各县乡土志》卷3，威海卫。

④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⑤ 徐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页。

究“应着力于地域的文化、历史等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化(比较)、影响性(发展)等着眼”^①。

对鲁东地区的研究,学术界大多集中于开埠较早及沿海港口城市,注重于这些城市的近代化发展历程^②,而对于城市发展阴影下的乡村社会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从学术史的角度上这一视角可以弥补学术史的空白。从区域史的研究角度上,对近代鲁东乡村社会的研究也可同其他区域研究成果作比较研究。在山东境内,既可以同张玉法先生对早期山东现代化研究相比较^③,又可同其他学者对山东其他地区研究相对照^④,通过这些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近代山东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从全国研究的视野来看,地方(区域)研究是社会研究的显微镜,它们使得社会科学获得对历史进程的最细微和最精确的理解。^⑤立足于鲁东地区研究,可同其他区域,如华北、江南、华南、西北等研究成果相比较,对近代中国研究予以某些启发与补充。

本书之所以选择乡村防卫作为近代鲁东乡村研究的出发点,是因为乡村防卫不仅体现了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特点,而且乡村防卫也体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变迁,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乡村精英的变迁,等等。本书试图通过对乡村防卫全面与细致入微的叙述与讨论,总结这些特点、特征与变迁,并在理论层面进行有意义的归纳。

本书的创新处与创新点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书立足于坚实的史料,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及宗教学的方法,寻求多学科的整合,第一次系统地对鲁东地区的乡村防卫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将乡村防卫放在近代中国乡村整体社会场景中加以深入考察,不仅考察了非常时期乡村的防卫力量与组织,而且也乡村日常生活的防卫进行了研究。

第二,本书以乡村防卫为中心,紧紧围绕各种权力在乡村的活动,以及各种势力在乡村社会政治变迁中的作用,以复原近代以来乡村社会

① 王先明:《走向社会的历史学——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

② 张彩霞:《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历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

④ 李庆华:《鲁西地区的灾荒、变乱与地方应对(1855—1937)》,齐鲁书社2008年版。

⑤ 李丹:《理解农民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政治权力的变迁过程，以图解释近代以来乡村社会政治变迁的规律。本书试图将民国前期的乡村防卫放入整个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第三，本书对土匪、政府、民众三者以及从其中派生出来的士兵与同乡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描述了当时乡村社会动乱环境下的特征。还特别分析了民间信仰与秘密会社对乡村防卫的影响，并研究了其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对地方基层各种势力在乡村防卫中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揭示了近代以来基层社会的变迁过程。

第四，本书论述了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对鲁东地区的地方防卫武装及力量的分析，以及采取的相应策略。为了便于在乡村发动革命，中共在乡村基层往往运用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方法动员民众。中共针对乡村社会存在的各种防卫武装，在大革命时期与土地革命时期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动员，提出了革命的武装斗争策略。

二 学术史回顾

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秩序混乱，乡村社会如何应对外部冲击，这是民国时期关于乡村研究与乡村建设的重要问题，因而乡村防卫在民国时期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其中以王怡柯的《地方自卫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王氏亲身参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实践，对于乡村自卫有切身的体会，书中王氏不仅介绍了民国时期地方及乡村自卫的措施，并且对各种乡村自卫的措施都给予了中肯的评价，王氏的著作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专门论述地方自卫的书。^①早在民国时期有许多学者对乡村社会中的组织，尤其是自卫组织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张中堂以社会学调查方法对山东省泰安县的“大眼滴”的乡村社会的组织进行了描述。^②竺允迪与薛伯虞则对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与自卫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从国民党在乡村社会推行的种种制度出发，如保甲制度等，指出了自治与自卫在乡村基层的重要性。当然他们是以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辩护为立足点来进行论述的。^③盗匪与乡村自卫是民国时期乡间社会的一对

① 王怡柯：《农村自卫研究》，开封建华印书局1932年版。

② 张中堂：《一个村庄几种组织的研究》，《社会学界》1932年第6卷。

③ 竺允迪、薛伯虞：《地方自治与自卫》，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